

一叩关与闭关：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门口

远涉重洋“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

1784年2月22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木质帆船驶离纽约港，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由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茫茫水域前往广州，揭开了美国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帷幕。时距英美《凡尔赛和约》签订、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仅仅5个月。

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伊始，便对古老的中华帝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与她当时面临的内政外交境况密切相关的。在经历了8年浴血奋战后，美国挣脱了英国的殖民枷锁，然而美国人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饱受战争的创伤，国内政治动荡，财政拮据，生产凋敝，市场萎缩，民众贫困，百废待兴。在北部边境，英国人以加拿大为基地，遍设据点，驻扎重兵，虎视眈眈地封锁着新生的共和国，并不时挑起印第安人的骚乱和暴动。在西部和南部边界，由于与西班牙的殖民地之间多处存在着边界纠纷，以及在密西西比河航行权问题上的冲突，美西关系也呈剑拔弩张之势，西班牙方面甚至在1784年宣布封锁密西西比河，严禁美国船只在该河航行。在国际舞台上，新生的共和国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独立后的美国13州，位居大西洋沿岸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人口约200万，面积仅32万余平方公里，由于长期

遭受英国的殖民掠夺，境内经济严重畸型发展。中部和南部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种植园经济地区，虽然土地肥沃，适于农耕，但工业却极不发达，长期依赖向英国提供烟草、稻米、靛蓝等单一作物，换取英国的制造品。东部和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土质贫瘠，资源匮乏，但漫长的海岸线、天然的良港和茂密的森林，为发展渔业、造船业和航运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与西印度群岛、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各地的海外贸易，始终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面临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在独立后一段时间里执政坛牛耳的北部商业资本集团，比战前更为迫切地渴望向海外寻求发展。

然而，传统的对外贸易渠道在战后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英国在被迫放弃长达 160 余年的殖民统治以后，对独立后的美国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1783 年 7 月 英美《凡尔赛和约》尚未签订 英国国会即颁布法令，取消殖民时代美国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不再向美国提供各种免税或减税商品，并对美国运往英国的货物征收高额关税。^①更为严峻的是，英国政府还下令关闭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严禁美国船只直接运送烟草粮食和造船材料等赴这一地区。而在殖民时代，这里正是美国主要的海外市场，美国人将本地产品运送到这里，换取英国的信用付款，“并以这笔款项去换取必需的旧世界的制造品和供应品。”²封锁西印度群岛，无疑等于卡住了美国经济的脖子。

此外，正面临革命危机的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封建君主国家，对于通过战争途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国，也心存芥蒂，并千方百计地将美国的船只排斥在他们的殖民地以及本土的港口之外。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殖民时代因为悬挂英

^① S·E·莫里森：《马萨诸塞海运史》波士顿 1921 年版，第 31～32 页。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8 页。

国的米字旗尚能安全无恙，改挂星条旗后，猖獗的北非海盗便蜂拥而上，不但将船上的商品劫掠一空，而且将船长和水手虏为奴隶送往拍卖场，美国人也因此望而却步。^①

新生的共和国，既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又被禁锢在一片面积不大、资源贫乏的土地上，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地，美国人的出路何在？一个对中美关系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休斯指出：“一言以蔽之……中国贸易！”^② 休斯的话或许说过了头，但对于立国之初“没有资源 没有资本 没有商业 没有朋友”的美国来说，开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印度市场，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长期流传于美国人中间的关于中国的神秘传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及诱人的中国商品，早已令美国人对陌生而又遥远的中国心驰神往。然而由于殖民时代对华贸易始终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美国人只能间接地从英国人手中获得中国货物。政治上的独立，使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不再对美国具有约束力，从而为美国直接进入中国排除了障碍。丰富的航海经历和冒险精神，海外贸易的悠久传统和经验，为美国人远涉重洋前往中国提供了精神动力。一批被闲置的战时武装民船，以及利用战时转运积累了财富的商人和水手的存在，则为美国人开辟中国市场提供了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样一个广泛的背景之下，美国商船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

较早倡导开辟中国市场的是约翰·雷雅德。他曾经追随英国著名航海家库克从事太平洋探险活动，并曾到过中国。对在美洲西北海岸仅用 6 便士便能买到的皮张，到了广州可以毫不费力地

^① 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02 页。

^② A·D·休斯：《两个海洋通广州 早期对华贸易史话》纽约 1944 年版，第 10～11 页。

以 100 元的高价卖出的情形，有着深刻的印象。1782 年从英国海军退役回到美国后，他极力向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们陈说，劝他们改行从事这项前途不可限量的贸易。^①

1783 年 12 月 18 日，大陆会议收到两名美国公民：菲利浦·摩尔和约瑟夫·沃德的请愿书，要求批准并保护他们的船只驶往中国，并建议派出一名驻华领事。^②

同月，几名波士顿商人集资装备了一艘名为“哈里特号”的商船，满载人参前往中国。该船在行至好望角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遇，后者因为怕美国人抢了他们在广州的生意，便以两磅茶叶换取一磅人参的高价，买下了全船货物。“哈里特号”的中国之行因此半途而废。

首航中国的荣誉于是落到了“中国皇后号”的头上。促成这次航行的是罗伯特·摩理斯。他早年从英国移民北美，由于从事西印度群岛的航海贸易及经营土地投机，成为费城乃至全美的巨商，据称他当时在美国的经济地位，可与 19 世纪的卡内基、20 世纪的洛克菲勒相媲美。他也是《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战时担任过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于 1783 年 11 月致函邦联政府外交部长约翰·杰伊告知：“我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在获得杰伊的支持以及美国政府同意远航中国的批文后，他便联络了波士顿和纽约的 5 名商人，着手筹划这次航行。因为怕担风险，两名波士顿商人中途退出。曾间接参与过对华贸易、对中国市场有一定了解的纽约商人丹尼尔·伯驾，以及其他两名纽约商人，则坚定地支持

参见詹瑞德·斯巴克斯：《约翰·雷雅德传》剑桥 1928 年版。

马文焕：《美国对华政策》（英文版），上海（无出版年月），第 1 页。

莫里森：《马萨诸塞海运史》，第 44 页。另据 1984 年出版的史密斯著《中国皇后号》一书考证，“哈里特号”的预定航行目标便是好望角，而不是中国。

摩理斯将这一计划继续付诸实施。他们共同出资 10.9 万美元 购买并装备了“中国皇后号”。这是一艘由战时私掠船改制而成的三桅木质帆船，总排水量为 360 吨。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装备 10 艘去欧洲的烟草船，或者购置 2.4 万英亩土地。摩理斯一人承担了其中的一半。

在这之后，他们精心挑选了船上的工作人员。船长格林时年 48 岁 却已有着 30 多年的航海经验，并与摩理斯个人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自 28 岁受雇于摩理斯后，他先是在摩理斯经营的海运公司中从事费城与纽约间的近海航行，后来又被提升为费城与拉丁美洲之间、费城与欧洲之间远洋航行的负责人。独立战争期间曾任美国海军上尉。商务代理人（一称管货员）山茂召也是独立战争的参加者，担任过炮兵少校，退役时由华盛顿签署的鉴定书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个有才华、有干劲和富有勇敢精神的军官”。^② 他通晓采购和推销业务，参加“中国皇后号”驶华时年仅 29 岁。随行的还有副船长、副商务代理人、会计、医生、水手等共 41 人，大多是经历过独立战争考验的精明强干、有胆有识的年轻人。

1784 年 8 月 28 日“中国皇后号”在经历了 6 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后 顺利抵达广州黄埔港。“为了避免中国对于开放贸易的国家索取额外的礼物”，该船以英国船只的名义向海关作了申报，^③ 中国官方文书因而对于中美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国官员既搞不清楚也不想知道“米夷”与“英夷”“佛夷”之间有什么区

参见史密斯：《中国皇后号》，费城 1984 年版，第 61 页。

^② J·昆西编：《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少校日志》，波士顿 1847 年版，第 111 页。

^③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 10 页。

别，只是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自己惯有的方式接待了这批不速之客。据山茂召回忆，“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来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区别，视我们为新人。当我们将所带的地图向他们展示，并说明我们的疆域扩张和人口增长的情况后，他们对我国拥有如此大的可供他们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①

在广州，美国人非常轻松地卖掉了运来的全部货物，并如愿以偿地采购了一大批中国土特产。据记载，“中国皇后号”运往中国的货物包括：人参 473 担，毛皮 2600 张，羽纱 1270 匹，胡椒 26 担，铅 476 担，棉花 316 担，总价值为 189519 元；从中国运回的物品多达 80 余种，主要有：红茶 2460 担，绿茶 562 担，南京土布 864 匹，瓷器 962 担，丝织品 490 匹，肉桂 21 担，总价值为 99676 元。^②此外，山茂召还为由华盛顿担任主席的全美军人组织——辛辛那提协会订购了一批印有该会标志的中国瓷器；格林等人也为自己采办了各种商品和礼品。由于要带回的货物太多，大大超出了“中国皇后号”的运载能力，美国人又在广州临时租赁了一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智慧女神号”。

12 月 28 日，“中国皇后号”自黄埔港起锚，次年 5 月 11 日成功地返抵纽约港。8 月 9 日，“智慧女神号”也平安地在巴尔的摩港靠岸。

船舶尚未抵港，一份诱人的广告已经在纽约街头张贴出来，上面写着：

“整箱装、半箱装和四分之一箱装的上等新红茶；各种瓷

昆西：《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少校日志》第 183 页。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5~1834》，牛津 1926 年版，第二卷，第 95 页。

器；各种不同质地和颜色的适合作夏季男衬衣的锻织品、丝织品、波斯绸和波纹绸；南京土布；绣金像和有珠扣的精美缎鞋；最优质的羊羔皮；象牙雕刻和漆器；茶叶罐；各种漆器茶盘、托盘和瓶架；丝绸手帕；束发锻带；桂皮、肉桂和黑胡椒；二百箱上等糖等。^①

据学者们指出，“这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份推销中国货的大广告”。^②货船停泊后，货物很快被抢购一空。战争结束后一度赋闲在家的华盛顿，从报端获悉“直接从中国来的一艘船已经到港”^③的消息后，也马上写信给友人蒂尔曼，请他代为购买一批中国货。这些信件及随信开列的详细货单，已被收入《华盛顿文集》，华盛顿购得的一些中国瓷器珍品，至今仍收藏在他的故居维尔农山庄。据统计，“中国皇后号”此行所获纯利约 30727 美元，利率高达 25% 以上。^④

年青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由于“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从此建立了直接联系。

闭关自守 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

在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络绎东来的行列中 美国是一个后来者。1517 年，即“中国皇后号”来华前的 267 年，第一支葡萄牙武装商船队强行闯入中国沿海 揭开了近代中西关系的帷幕。1575 年，两名西班牙使者从其菲律宾殖民地来到福建；1601 年 第一艘荷

^{①②} 参见齐文颖：《关于“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1），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1 页。

华盛顿：《致蒂尔曼》，载 J·F·乔克编《华盛顿文集》华盛顿 1939 年版，第 28 卷，第 223 页，第 238~239 页。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 11 页。

兰商船驶抵广东；1619年，俄国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派遣的彼德林使团从北方陆路进入北京；1637年，一支拥有4艘武装商船的英国舰队闯进虎门，强行与中国达成第一笔直接交易；1698年路易十四派遣的第一艘法国商船偕同康熙邀请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1752年，第一艘德国商船“普鲁士国王号”也早于美国32年抵达黄埔港。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列强东来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为背景，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商品市场为目的，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伴随着西人东来而出现的，是东方民族的被掠夺，被奴役，被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之中。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被动的闭关自守政策。

“中国皇后号”来华的1784年，中国的纪元是乾隆四十九年，满清入关统治中国已持续了140年，在历经康、雍、乾三代长达百余年的经营之后，清朝封建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也开始了走下坡路的时代。在这140年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1644年清兵入关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抗，切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政权与内地的联系，清政府先后于1655年、1656年、1662年、1665年和1675年5次颁布“禁海令”严厉禁止官民人等出海贸易并于1660年、1662年和1678年3次下达“迁海令”，将沿海沿江居民内迁30里至50里。在这40年间，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基本上被强行割断。到了1684年，即“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前100年，康熙在统一台湾后，当即以胜利者的宽大胸襟宣布“开海贸易”并于第二年在苏、浙、闽、粤沿海设置了四个对外贸易的港口，中西贸易开始呈现蒸蒸日上之势。可是，来华的西方商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频繁出没于距中国内地更近的宁波、厦门等地，并随带武器，勾结当地奸徒，从

事非法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和疑忌。1757年，乾隆正式下令关闭宁波等三口，只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即从这时开始实行。1782年，亦即“中国皇后号”来华的前两年，清政府又正式确立了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

所谓公行，最初是由广州地区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行联合成立的一种封建行会组织，它的目的在于消除彼此间的竞争，垄断对外贸易，1720年创设后曾几度存废。为了加强对中外贸易的监督管理，乾隆于1782年正式下令予以恢复。在中外交往中，公行担负着商业的和政治的双重职能，公行的行商一方面是进出口贸易的垄断者，负责为外商承销一切外洋进口货物，代办内地出口货物，并统一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政府及海关与外国商人之间联系的中介人，负责承保外商应缴纳的进出口关税，照管并监督外商在华活动，转呈外商给官府的禀帖，传达官府给外商的谕令。

为了防止行商和外商内外勾结，清政府对行商的进退有严格的限制，承充行商，除了家资殷实外，还必须要有其他行商作保，并报户部备案。同时规定，外国商船进港后，必须由行商担任保商。最初由各行商间轮流具保，后来改由外商自行投行认保，1835年又规定除自投认保外，每船另由海关指定保商一名，专司查察。^①

就其性质而言，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

与公行制度相适应，清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外商的规条和章程，对来华外人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防范。其要点包括：

(1) 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来华外商通常须于阴历九、十月间随

有关公行制度，参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洋船回国，届时如因货、款未清不能回国，只能酌留一二人 在澳门过冬，第二年搭船回国。(2) 外商进入广州后，必须住在行商为其特别建造的“夷馆”里，平时除在规定日期、规定时间内由通事陪同往规定地点散步外，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严禁中国民众随意出入夷馆。(3) 禁止外人携带眷属来夷馆居住，其随同来华的眷属只能滞留船上或寄居澳门。(4) 禁止外商私雇中国民人，其所需引水、买办 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 所用看门、看货、挑水等人，责成夷馆买办按规定人数代雇。(5) 外人不得直接与官府发生联系，如欲向官府具禀事件，一般应由行商据情转禀。(6) 禁止偷运枪炮、私带番哨进入夷馆。(7) 禁止外商护货兵船驶入内洋，并在外国商船进泊之处拨派兵丁严格巡查。(8) 严行缉查在外洋私自买卖税货以及夹带违禁物品进口。①

这一系列的制度、规条和章程，即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其中虽不无自卫和防范的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政治上是清朝政府既对西方殖民势力有所疑忌，又对国内民众的反清情绪充满警觉的表现；而在文化上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意识和保守心理的集中表露。一言以蔽之，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政府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侵，所采取的一种有限制地对外贸易的政策。

早期的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的。

贸易扩张 美国在广州的商业进展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 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1785 年 5

参见《史料旬刊》，第三、四、五、九期。

月 12 日“中国皇后号”驶返纽约的第二天,《纽约独立报》对这次航行作了详细报道,并称道这是“一次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的和硕果累累的航行”。^①《劳顿氏纽约邮班报》在同一日的报道中,号召全城的“教堂敲起钟来,一起向上帝感恩”。^②其他商业城市的传媒也竞相对这一创举加以报道。山茂召向外交部长杰伊递呈了有关这次航行的详尽报告,强调:“我们同地球最东部的国家胜利通航了,这对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和那些同贸易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国会在收到外交部转来的报告后,对这次航行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有力地说明,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并表示“国会对于美国公民第一次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就获得如此之好的结果深深地感到满意”。^③沿海各地的商人和水手更是跃跃欲试,渴望前往东方追逐财富。据一位美国史学家介绍,在那段日子里,“从新英格兰的城镇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村落那怕有一只能载 5 个人的单桅帆船,都在作去广州装茶的打算”。^④在“中国皇后号”的带动下,美国社会很快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华贸易热潮。

1785 年 12 月,一个名叫斯图亚特·狄恩的武装民船老船长,驾驶着一艘仅有 84 吨的单桅帆船继“中国皇后号”之后率先雄心勃勃地从纽约驶往广州。1786 年 1 月,由塞勒姆商人装备的“土耳其皇帝号”启航东行,成为这个东部港口第一艘到达广州的船只。同年 2 月,山茂召受聘为“希望号”的商务代理人,再次踏上前往广州的航程,他此行还随身携带着一份国会任命他为美

《纽约独立报》,1785 年 5 月 12 日。

② 《劳顿氏纽约邮班报》,1785 年 5 月 12 日。

昆西:《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少校日志》,第 340~341 页。

休斯:《两个海洋通广州:早期对华贸易史话》,第 27 页。

国驻广州领事的证书，这是美国在好望角以东设置的第一个领事。摩理斯在第一次冒险尝到甜头后，也很快筹集资金，装备了一艘比普通的贸易船要大得多的旧式快速舰“联盟号”于 1787 年 6 月从费城出发，并第一次取道澳大利亚南端的海角远航广州，运回了超出“中国皇后号”5 倍、价值高达 50 万美元的中国货物。同年 12 月 27 日，“华盛顿将军号”开创了普罗维顿斯的商船前往广州的先例。1789 年夏季，波士顿商人派出的“哥伦比亚号”在北美西北海岸收集到足够的毛皮后，直接在那里横渡太平洋到达广州，然后取道好望角返回波士顿，创下了第一次由太平洋西海岸直航广州和第一次环绕地球与中国贸易的两项美国记录，该船在第二次航行广州的途中，还发现了后来以它命名的那条著名的河流“哥伦比亚河”。

在“中国皇后号”首航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东海岸的重要港口都与广州建立了商业联系。到 1789~1790 年度来华美国商船已达 14 艘；1790 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美国全部进口货物中已占 1/7 而到了 1792 年，美国在广州贸易中的地位已超过荷兰、法国、丹麦等国，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到 18 世纪结束时，络绎来华的美国商船总数已达 118 艘之多；1803 年，美国对华贸易总值超出了欧洲大陆国家对华贸易的总和。^①

吸引美国商船接踵来华的，是美国社会对中国商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高额利润。就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而言，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以茶叶、丝绸和土布为大宗，这三种商品长期占据了美国输美商品总额的 90% 以上。其中茶叶尤为美国商人的首选商品。在 18 世纪最后十年间，中国输美茶叶平均每年为 1.7 万余担而到了 1831 年~1840 年的十年间输美茶叶上

① 参见 F·R·杜勒斯：《旧中国贸易》，1930 年波士顿和纽约版。

升到平均每年 11.36 万担左右,增长了近 5 倍。1817~1845 年间,中国输美茶叶平均每年占输美商品总值的 58.04% 最高年份达 81% 以上。从 1796~1797 年度开始,美国商人每年从广州市场购买的茶叶几乎都超出了欧洲各国除英国外 的总和。^① 美国人对茶叶质量的需求也不断提高,最初多为质次价廉的武夷红茶,后来改为质量较好的红茶小种。1800 年以后 高级绿茶 尤其是熙春、雨前和副熙等品种,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青睐。

此外,中国的丝绸制成品由于色泽艳丽、质地精良,在美国社会也享有盛誉;南京土布则由于经久耐用和价格低廉而受到美国平民的欢迎;瓷器常被作为压舱底货带往美国;桂皮、樟脑、大黄等土特产以及扇子等工艺品,在美国也有一定市场。

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由于刚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东部地区工业革命正在起步,广阔的中部和西部尚处于开拓阶段,很难拿出什么农产品和制造品来与中国交换,物色运往广州的货物,始终是困扰美国人的一个大问题。

早期美国输华商品,主要是从新英格兰山村中采集到的野生人参。在 18 世纪最后十余年间,美国输华人参平均每年约 830 余担;进入 19 世纪以后仍持续增长,至 1845 年前平均每年输华 2005 担,比上个世纪增长近 2.5 倍。^② 人参作为一种珍贵补品,很受中国上层人士欢迎,在广州市场上它的价值是以“黄金来衡量”^③ 的,但因此也使社会需求量受到极大限制,加之长期滥挖,货源难以为继,远不足以抵销美国对华商品的需求。

据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文及表,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参见汪熙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文及表。

^③ 杜勒斯:《旧中国贸易》第 5 页。

一次偶然的机 会，美国水手在美洲西北海岸捡到一些海獭皮，随船运到广州后，竟出乎意料地卖出了大价钱，这使他们大为振奋。在短短几年间，美国人便开辟出了 3 个毛皮供应地。一是美洲的西北海岸，美国商船在那里用廉价的生活用品和工艺品，与印第安土著换取水獭皮和其他毛皮，运往广州出售。二是福克兰群岛、靠近南美西部海岸的一些岛屿和南太平洋一带，美国人组织起一支支捕猎队，猎取海豹皮运往广州。三是北美内地，美国商人在那里设立了许多皮货贸易行，专门搜集生皮，运往纽约等东部口岸，再运至广州。据统计，在 18 世纪末叶，美商每年运往广州的毛皮尚不超过 10 万张，到 1800~1824 年间平均每年已高达 168384 张。^① 毛皮贸易为美国商人提供了三次赚钱的机会：先以很少的本钱取得毛皮；运到广州市场卖出大价钱；买进茶叶及其他货物，运到美国及欧洲又可以赚一笔大钱。然而，由于遭受灭绝性的捕杀，毛皮资源很快陷入枯竭，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这项贸易便接近尾声了。

又是一次偶然的机 会，一艘美国商船在途经夏威夷群岛时 将那里盛产的檀香木作为燃料装上了船，运到广州后很快发现了它的价值。于是，檀香木又很快成了美国人追求的稀罕物，他们用各种廉价物品，从夏威夷土人或斐济群岛的酋长手中换取檀香木，运往广州市场以高于产地 33 倍的价格出售。仅 1822 年，输入广州的檀香木即达 26822 担，价值 268220 美元。^② 当然，这类贸易也好景不长，因为有限的檀香木很容易被砍伐殆尽。

唯一能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农产品是粗棉，但数量极为有限，1804~1812 年间平均每年输入中国 5000 余担，用以换取中国的

据汪熙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文及表。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第 54 页。

土布。^①这一现象突出地表明，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美国，尚无力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机器纺织业。

为了弥补输华商品的不足，美国商船不得不奔波于世界各地，搜罗各种运销中国的商品，与此同时也将中国商品转运到其他地区。这些商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沿途收集到的东方产品，如斐济群岛的海参，巴达维亚的糖和咖啡，苏门答腊的胡椒，夏威夷的檀香木，孟买的棉花，菲律宾的大米，以及南洋各地的玳瑁、珍珠母、燕窝、鱼翅等。在早期对华贸易中，这类东方商品通常要占美国输华商品总额的 1/3 左右。^②一类是西方产品，美国商人用本国出产的烟草、面粉、马具、干酪、肥皂等，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手中换取棉毛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从拉美国家换取白银，辗转来华购得茶叶等中国商品后，运销国内或转销欧洲和拉美。英国的自由贸易商由于在中国市场上受到东印度公司排斥，也乐于假手美国商船染指广州贸易。

这种转运贸易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达到了高峰。由于欧洲各国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牵制而无暇东顾，对华贸易一度陷于停顿，美国则乘虚而入，利用其远离欧洲战场的地理优势和中立地位，大力发展欧洲与中国间的转口贸易，“使美国人自 1795 年以来实际上成为世界公共的搬运夫”。^③在 1802~1811 年间，美国来广州的船只多达 287 艘，而同一时期欧洲大陆国家来华船只加起来只有 31 艘，英国来华船只也不过 475 艘。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来华船舶吨位已超过了英国。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从广州运走的茶叶平均每年占广州输出茶叶的 22%，最高年份的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四卷，第 384 页。

② 汪熙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中美关系史论丛》第 100 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一册，第 170 页。

1808年达到 47%，其中 1/4~1/2 被转运到欧洲各地。

为了适应转口贸易的需要，美国对华贸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常驻代办商取代随船管货员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要经办人，常设的商业行号也开始出现。1803年，波士顿的托马斯·普金斯商行在广州正式设立分行，这是该行继在伦敦设立派出机构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二个派出机构。该分号除经营本商行的对华业务外，还兼营美国国内其他行号委托代办的对华贸易。与流动的商船相比，固定的商行不受短暂的贸易季节限制，更容易熟悉中国市场，对华贸易也因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激化了英美之间的商业竞争，进而引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受战争影响，美国对华贸易一度中断。1814年英美《根特和约》签订后，美国不但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1816~1824年，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所谓“和谐时期”。随着人口增长、经济恢复、社会繁荣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美国社会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在这一基础上，对华贸易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815~1839年间美国来华商船，每年少则 18 艘，多至 229 艘，两国贸易额在美国对外贸易额中由 18 世纪末的 2.7% 上升到 19 世纪上半叶的 4%，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则由 6% 上升到 21% 左右。^② 在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中，对华贸易无论对于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还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金融和铁路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贸易方式的改变。战前美国各大港口几乎都有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

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有关文及表估算。

^② 汪熙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中美关系史论丛》，第 121 页。

为了分担风险和便于筹集资金，他们通常在亲友间集资购买多样化的商品，载往广州出售。战后随着欧洲商人重返中国市场，贸易竞争空前激烈，一些商人或小商号由于贸易规模小、风险大、资金周转慢，很快被排挤出中国市场，以致于对华贸易越来越集中到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几个较大的港口和少数几家殷实的行号手中。据称，1829 年仅普金斯洋行一家便操纵了对华贸易的 1/2。普金斯洋行在广州歇业后，旗昌洋行以及奥立芬洋行、赫尔德洋行、卫特摩洋行代之而兴，在鸦片战争以前，这四家洋行几乎垄断了美国全部对华贸易。

其次是商品结构的改变。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美国国内的纺织业迅猛发展。据统计 美国的纺纱厂在 1803 年只拥有 4500 纱锭，到 1840 年已达到 220 万纱锭。^① 由此带来的变化是，美国纺织品不但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排挤了中国土布和丝绸，而且开始向中国市场渗透。1825 年美国输华纺织品已达 16 万元，1830 年增长到 50 万元，1844 年突破 100 万元。^② 在美国输华产品中，本国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转手贩运的外国货物则逐渐减少。商品结构的变化突出地表明，对中国市场的占有正逐渐取代对中国货物的需求，成为美国商船来华的主要目标。

再次是汇兑制度的改变。由于战后英美之间商业关系的改进，在美国对华贸易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以伦敦汇票代替现金的汇兑制度，美国商船在载运英国制造品来华的同时，随身携带由伦敦商行付款的汇票，以此作为购买回程货物的支付手段，返回伦敦后再加以结算。这种汇兑方式出现于 1819 年，该年度美商携带来华的伦敦汇票为 20 万元，10 年后的 1829 年上升到 66 万元，到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中译本），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356 页。

汪熙等：《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中美关系史论丛》，第 132 页。